

SELLING

[美] 黄亚生 著

钱 勇
王润亮 译

改革时期的
外国
直接投资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CHINA

SELLING

改革时期的 外国直接投资

[美] 黄亚生 著

钱 勇 译
王润亮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黄亚生著,钱勇、王润亮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7

ISBN 7-80148-859-8

I. 改… II. ①黄…②钱…③王… III. 外国投资:直接
投资—研究—中国 IV. F8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774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100005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1300 1/32

印张:15 字数:400 千

版次:2005 年 9 月第一版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份，中国是全球性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受国。许多人为中国大量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而欢呼，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

在本书中，黄亚生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反诘：中国大量引进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

黄的前提是：FDI——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经济现象，而非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如市场的扩张或劳动力的成本低下，一个国家获得的FDI多于或少于国内投资，取决于外国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在20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而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于是，外国企业就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

黄界定了造成竞争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它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些资源分配给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其结果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无竞争力。另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是因国家所有制所致——它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及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中国的FDI所带来的主要好处与以下方面有关：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私有化功能、提供给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黄认为，尽管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好处，但是，人们还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行评价。中国的局部改革——尽管它成功地扩大了市场范围——但至今却未解决中国经济中与分配无效率有关的许多问题。

作者简介

黄亚生 原哈佛商学院教授，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的通胀与投资控制》（1996）、《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2002），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麦克阿瑟基金的奖学金获得者。



三辉图书

策 划 人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刘 刚
特约编辑 / 依 稀
封面设计 / 林 涛
版式设计 / 董子源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谨以此书献给
父亲黄钢和母亲谭家昆

出版说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教授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部研究力作，自 2002 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书中的一些观点，也不断引起质疑或赞扬。

此书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和当下的认识，尽管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资料收集得不够充分，某些结论失之偏颇，但其注重调查，占有第一、二手资料，建立实证研究模型等研究方法，对中国的经济学者而言，似仍颇有参考价值。

2005 年 8 月 17 日

缩略词表

AAPA 单位分公司的平均资产

BAIC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

BGF 北京齿轮厂

CHF 中央直属企业

CJV 合作合资企业

CMA 中国制造商协会

CSI 中国策略投资公司

ECE 华人经济体

EJV 资产合资企业

FAW 一汽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DIPA 单位分公司的 FDI

FER 外国资产比率

FIE 外国投资企业

FMC 外国市场控制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KG 广东科龙(容声)集团

GNP 国民生产总值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JV 合资

LDC 欠发达国家

M&A 并购

MES 最低效率规模

MNC 跨国公司

MTBF 两次事故之间的行驶里程

NCIC 南昌化工公司

NPL 不良贷款

OECD 经合组织

OP 外部加工

PBC 中国人民银行

PLA 最大分公司的比例

PPG 匹兹堡平板玻璃工业公司

PPP 购买力平价

R&D 研发

R&DE 研发费用

RCC 农村信用合作社

RMB 人民币

SAIC 上海汽车工业公司

SER 国有资产比率

SLR 社会债务比率

SME 中小型企业

SOE 国有企业

SPC 国家计划委员会

SVW 上海大众

TFP 全要素生产率

TVE 乡镇企业

UCC 城市信用合作社

UNCTAD 美国贸易发展委员会

WFIE 外资全资企业

WTO 世界贸易组织

本书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些年份里,中国的 FDI(外国直接投资)占到发展中国家的 50%,而且,中国是 FDI 的第二大接受国,政府官员、商人、经济学家为中国的大量引进 FDI 欢呼,认为是改革时代的重大成就。

本书的中心结论是:中国大量引进 FDI 是其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标志。本书的前提是:FDI——本质上讲——是微观经济现象,而不是宏观经济现象,在给定水平的宏观经济基础上,如市场的扩张和劳动力的成本低下,相对国内投资而言,相对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合同安排之间的相对值而言,一个国家获得的 FDI 是大还是小,取决于外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涌入中国,是中国企业部门的某些本质性问题和宏观基础的前景良好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书对中国企业部门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界定。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中国金融资源和更广泛的经济资源被分配给最无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部分资源分配给最有效率的企业,即私有企业。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将经济效率最高的企业——即中国真正的私人企业——边缘化了。对私企的经济歧视和法律歧视的累积效应,使得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企业部门是普遍无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具有内在无效率,而私有企业缺乏资源和财产权的安全,难以进行发展和增长。第三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

割——这个现象部分是由于国有制度——约束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和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本书认为,中国的 FDI 流入的主要好处与市场进入条款无关,也与知识转移、技术扩散或获得出口渠道无关,这些都是经济学文献中所主张的企业层面的利益。相反,与中国的 FDI 流入有关的主要利益与以下情况相关:在政治上反对明显的私有化程序的环境里向外企提供的私有化功能,在强制实施对私人部门的严格的信用限制的经济系统中向私有企业提供风险投资,以及在一个条块分割的经济中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利益,但是,人们应该询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和利益。

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行评估。本书提出了一个猜想: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策略的动机是挽救社会主义而不是终止社会主义。局部改革——尽管成功地增大了市场范围,但是,至今还不能——将来似乎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某些基础性的无效率问题。在处理这些无效率问题上,就需要实现私有产权的安全,并对私有产权作出更进一步的承诺。这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选择,是中国迟早必将正视的选择。

前 言

本书的调查研究始于 1998 年秋季,那时,我刚刚进入哈佛商学院。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是一根陡峭的学习曲线。我前期工作处理的是一般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度。作为经济现象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中国经济的许多具体方面,与我早期研究的经验分析重点和方法论手段,有极大的不同。

在我沉浸于这个新课题时,哈佛商学院为我提供了一个使我奋发的良好研究环境。通过向同事学习,并通过传授和处理《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这是哈佛商学院的最成功课程之一,我的学生通俗地将这门课的名字——Business,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简称为 BGIE)这门课的课程资料,我开始熟悉并慢慢地处理许多经济问题和 FDI 问题。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的本质与制度极为相关,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_{政治经济}领域,但是,我的制度分析基于对商业发展动态和 FDI 问题的经济逻辑的严格理解。在这一方面,我因加入哈佛商学院而得益良多。

当我踏入一个不同的研究轨迹的时候,除了有所助益的学习环境之外,我还特别得益于同事们的建议和指导。我首先要感谢潘凯·根默瓦特教授、汤姆·麦克劳教授、黛博拉·斯柏教授和罗·韦尔斯教授。他们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部分草稿。他们密切关注本书的进步——和退步。他们对本书的观点、语气和组织结构提出了详细的极富价值的评论。特朗·卡拉教授、乔治·洛奇

教授、休·皮尔教授、朱莉娅·路登博格教授、布鲁斯·斯科特教授、理查德·威厄特教授和丹尼尔·约菲教授欣然阅读了本书的定稿。他们的评论使我的观点更加清晰,避免了某些难以发觉的错误。桃乐茜·A. 伦纳德教授和迈克尔·约西勒教授对书稿成型阶段的前几章进行了评论。我特别感谢沃伦·麦克法兰教授,他的鼓励和指导不仅帮助我经受了本书写作过程所面临的挑战,而且帮助我经受了新的教学研究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哈佛商学院的研究部门——在其两任主任肯尼思·费罗特教授和保罗·冈珀斯教授的领导下——慷慨为我提供了基金,这使我能够完成这个研究。

我也得益于其他学校的同事的帮助。在哈佛,我得益于与以下教授的讨论:比尔·阿耳福特、理查德·库珀、马歇尔·戈德曼、默尔·戈德曼、威廉·科尔比、罗德里克·麦克法克尔、德怀特·伯金斯、伊丽莎白·佩里、托尼·赛奇和已故的雷·弗农等教授。几年中,我与以下教授主持了许多有关中国经济和 FDI 问题的讨论:清华大学的傅军、香港理工大学的戴维·李、南京大学的卢明红、密歇根大学的艾伯特·帕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民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钱颖一、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德·斯坦弗德、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魏尚锦。尽管这些讨论是海阔天空式的漫谈,但是,我还是从这些讨论中得到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我将其作为本书所提出观点的一个背景。

我特别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在本书提交给剑桥出版社进行审订时,他对本书手稿进行了细心的、周到的和详细的评论。洛顿教授与我依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批评促使我从一个更基础的层面来重新思考某些观点和立场。我也要感谢西安大略大学的保罗·别密斯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伯特尼、伦敦经济学院的阿瑟·侯赛因、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密歇根大学的琳达·李、兰德公司的查尔斯·沃尔夫、华盛顿大学的克里斯廷·王、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纽约大学斯特恩学院的伯纳德·杨,

他们对本书的个别章节进行了评论。

在这些年中,我将本研究的部分内容提交给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卡图研究所、外交委员会、哈佛大学、机构投资者杂志、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太平洋论坛、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密歇根商学院威廉—戴维森研究所、世界银行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所举办的会议、研讨论和座谈会。我无法对所有的与会者逐一致以感谢,就让我在此一并致谢。

学术界以外的许多人也对我极有帮助。特别是,我要感谢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星海博士和胡瑞岩博士、高盛公司的佛瑞德·胡博士、红石实业公司的潘石屹和张新、保德信保险公司的布鲁尔·斯通、曾任职于《远东经济评论》的潘·亚兹克、曾任职于宝源投资的严苏哲、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张宇军博士——他与我就中国金融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发展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讨论。陶氏化学公司的张楚斌博士欣然对硅厂的生产流程进行了解释。富达公司的简·梁给予我许多统计方法的帮助。同时,我对许多与我面谈的中国经理人和外国经理人致以深深的感谢。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几位能干的研究助理也使我得益良多。他们是:尼古拉斯·巴特利特、詹森·曼恩、莎拉·马修斯、柯尔斯顿·奥尼尔和弗吉尼亚·威尔莫汀。现任职于世界银行的詹尼弗·桂和现任职于哈佛法学院的陈小平,在书稿的不同阶段对我的中国研究给予了极大帮助。哈佛商学院亚太研究中心(香港)的卡米尔·叶和佛瑞德·杨帮忙联系人员、组织面谈并对关键性的后勤支持进行了安排。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玛丽·蔡尔德、斯科特·帕里什和斯蒂芬妮·赛克森给予我一以贯之的支持和帮助。最后,但不限于此,我还要感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南希·赫斯特在文本编辑上所给予的卓越帮助,此前,她很多次在我的其他研究项目上也给予了帮助。尽管我希望能减少一点责任,但是,上述的受谢者对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或误断不负任何责任。

在我从事这个项目的过去五年中,我的家庭成员帮助我解决了许多生活压力(包括精神压力和其他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我的

研究生涯和执业生涯。我的兄弟——黄京生——在中国从商多年,从实业家的角度告诉了我他对 FDI 问题的看法。我的妻子——琼·杨忍受了我多次的长期在外,同时还要处理她自己的职业挑战。在许多次的餐桌交谈中,琼——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现为商业咨询师——对我的企业策略分析进行了质疑,有时还伴随着我三岁女儿的大声抗议。若没有她坚持不懈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此书的诞生。我们的女儿——昆昆——在此书刚开始写作时出生了,我不止一次地想:我的书稿进度为什么总是赶不上她的成长速度呢?

最后,作为已为人父的我,我将永不能忘记我的父母给予我的教育和指导。我的父亲黄钢在 1993 年逝世,我的母亲谭家昆在本书 1998 年开始作调查研究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个动荡的时期,中国的学校都关门了,正规教育体系也崩溃了,是我的父母教给我学习和知识的价值。我永远感激他们。本书谨献给我的父母。

黄亚生

波士顿,马萨诸塞

2002 年 4 月

目 录

图表目录	1
缩略词表	1
本书概要	1
前言	1
第一章 简介	1
第二章 分析框架	69
第三章 中国公司部门的问题	114
第四章 对非国有企业的限制和外国直接投资	166
第五章 国有企业与破产状态所引致的外国直接投资	236
第六章 经济条块分割与外国直接投资	291
第七章 结论	345
中文版后记:对一些问题的回答	394
参考文献	411
名词对照表	439

图表目录

- 表 1.1 关于中国的外国资本流入量的不同测度值(1979—2000)
- 表 1.2 相对 FDI 规模、宏观经济发展与商业环境(按年份计算)
- 表 1.3 香港地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中國大陸的制造行业中的最大 FDI 值(%)
- 表 1.4 中国制造业的 FIEs 的行业特征(1995, %)
- 表 1.5 三个经济体(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印度尼西亚)中 FIEs 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
- 表 3.1 汽车业的集中率:4 国比较(占行业产出的比例)
- 表 3.2 所选省份中的贷存款比率和 SOEs 份额(1988 和 1993)
- 表 3.3 中国工业各所有权类型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量度(1995)
- 表 4.1 中国服装业中的外国资产比重、就业规模、资本密度和出口倾向
- 表 4.2 服装业中企业的政治等级和 FIEs 的资产结构,百分比(企业的数量)
- 表 4.3 两类 FIEs 中的外国所有权比重:合作 JV(CJV)和资产 JV(EJV),百分比(企业数)
- 表 4.4 中国的前 4 位电冰箱制造商(1982—1998)
- 表 4.5 私人所有权对外国资产比率的效应的 Tobit 分析
- 表 4.6 服装业中私人所有权对外国资产比率的影响的 Tobit 分析
- 表 4.7 中国手工艺品业中的 FIEs 的外国资产比率及企业的政治